

如今邁步從頭越（一九七七年）

盧希平接到來自北京的通知，告訴他“父親已去世”的消息。最後一次見到父親，那已是十五年前，在火車站上汽笛長鳴，他哭成淚人似的緊緊擁抱著父親那勞累佝僂的身體，不忍離去，直到火車真要開行的最後一刻。想起那生離死別的一幕，他就忍不住淚下如雨。沒想到那次別後，真是從此陰陽永隔，再見無期。最可恨的是，原來父親早在六年前已鬱然而終，為什麼拖到現在才告訴死者的親人？他一時之間感到悲憤難平。屈指算來，父親死時正是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後，那年月想是國內政治最黑暗、最荒唐的時候。如今毛主席也走了，文革也終於過去了，共產黨才慢慢抽出時間來處理這些小事情吧？他感到非常悲哀。

希平當年離開祖國時已十二歲。可是在他去國前童年時期那麼長的一段日子裏，只有他還在襁褓的時候，在歐洲期間和父母據說共同生活過兩年。自五零年回國後，父親一直在全國各地攀山涉水，鮮有回家相聚的機會。他一直以來是有父如無似的，與母親及弟弟相依為命。父親一直以來不斷向上級請示，要送他們兄弟倆人出國讀書發展，但總不得要領。他小時候不懂事，老是追問母親，為什麼不批准他們到香港去依親。還是他長大後，從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中慢慢琢磨出來的，從來沒有人和他正式提起過的，這樣一條“大道理”：那就是——海外關係和工作性質。父親一生的重責，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來的任務，是為國家尋找石油礦藏。為此，他一年到頭跑遍河南江北和遼東川西的窮山惡水，做地質勘探的工作。一篇又一篇的研究報告和地質分析，屢要趕著如軍令狀似的，突擊“死線”，不斷上報。

當年父親跟隨一批全國頂尖的地質學家們，每次出門時都好像生離死別，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相見。人家父親如要出門，總大約知道什麼時候回來，至少過年時總能有所期盼。但他的父親不一樣，往往一別經年，杳無音訊，就像死了一樣。他只床前有一首不知道是誰寫給父親的詩：“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遊。峰巒隱復現，環繞湘水頭。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他可以想像詩中描述的那種風餐露宿的艱難。

當年反右運動時，有這樣一種不成文的黨內規定：凡是從外國回來的，或者在國外有親戚的，都有所謂“海外關係”，一律列入受嫌疑的名單。凡是知識份子，而且是越高級越嚴重，都一律列入右派的疑似序列。還有就是越是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重點知識份子，越是要加以“防範保護”。那就是：妻子兒女等直系親屬不得批准移居國外，包括港澳臺在內。這是不折不扣的“人質”政策，要知識份子乖乖聽命，動彈不得。還有更不可思議的是，子女要申請入團入黨，也特別受歧視，遭到刁難，因為不得不照顧到“出身”的問題。有知識就有原罪。而且這原罪還要累及親人和下一代。反正一切都成為障礙。如果愛國和報國要經受這麼多的磨難，那真是令人氣餒，難以理解。

他和父親之間雖見面的日子這麼少，他卻又好像和他十分相知。那是因為父親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家書。差不多每月一封的家書，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兒子的期盼和勉勵。他在信中說：“做人不能徒恃天份，必要經過理性的整理、歸納，才能深深地化入自己的心靈，成為你個性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倘若你有這個思想準備，特別在智力方面多下功夫，那末你將來的收穫一定更大更豐富，基礎也更穩固，主要是你心靈中最優秀最突出的部分。從人家那兒學來的精華，要緊緊抓住，深深地種在自己的性格裏，無論何時何地，這一部分始終不變，這樣你才能把獨有的特點培養得厚實。青年人最容易給人一個忘恩負義的印象。其實他

是眼睛望著前面，饑渴一般地忙著吸收新的東西，並不一定是忘恩負義。知識份子一般都是這種特性。但懂得這心理的人很少，你千萬不要讓人誤會。國家多難，我們不要問國家可以為我們做什麼，反而要問我們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希平對這段父親勉勵的文字，印象特別深刻。他把這封信放在身邊，閒時反覆念誦，到得後來，都可以純熟地背出來了。他深感父愛的偉大，而父親對他的關愛，不在於平時如一般家庭那樣日夕相對，如膠似漆式的父慈子孝，而是博大精深，包含著對國家民族遙遠而浩渺的深情厚意。

還有一封父親寄自邊疆大漠之北的信，希平也是感慨繫之。可以想像得到，當他父親寫那封信時，身處極為艱險的環境而猶奮筆直書示兒，足見父子情深一片，愈是困難他愈是想到自己的兒子。希平接此信時，是在一個天朗氣清，萬里無雲，江南初夏的晴天白日。他想到父子天各一方，父親置生死于度外，而自己卻相對地安然無事，坐享清福似地過日子，真是心內十分過意不去。信中劈頭就寫道：“這幾天在這裏為了防風防沙，各單位各組織都緊張非凡，日夜趕著建設防禦工程，抵抗大漠狂風和沙塵暴的侵襲。據預測，今年的風沙特別大，有高出歷史上最高危的記錄的可能。為了預防起見，故特別忙碌辛苦。這裏為了做鞏固工程，非常艱苦。為了搶修搶救各受災地區，軍民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同時又保住了多少生命財產。都是些英雄們與風沙搏鬥。受害最深重的地方，老百姓無處安身，躲在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內，大小便、死屍、髒物都堆積在一起而無人清理，多少的黨員團員領先搶救，這種艱苦卓絕的鬥爭是多麼可怕、多麼偉大。在這些日子裏，我常常聯想起你，你不用參加這些與自然界的殘酷鬥爭。你是幸運的孩子。新的一代人在中國，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天之驕子。一個人的機會、享受，是以千千萬萬他人的代價換來的。那是多麼寶貴。你得抓住時間，提高警惕，非苦

修苦練，不足以報效國家，不足以對得住同胞。看重自己就是看重國家。不要忘記了，祖國有千萬同胞都和爸爸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林則徐說過：‘苟利國家生死以，不因禍福避趨之’。爸爸一生能夠給予你的，物質上恐怕不多了，惟有這些勸勉，或許將來你定會衷心地感受到內中的深意，因而不怪爸爸這麼多年以來長期不在你的身邊。不管天涯海角，總會有爸爸在那裏牽掛著你，想念著你。”

多少次他捧讀這篇家書，感到內心震撼，無邊的哀愁和遺憾滿於胸臆，胸口感到抽搐的痛楚，而淚水模糊了雙眼。為了到處找石油礦藏，爸爸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他組織普查隊伍往第一線，幾年間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他按照多年來艱苦研究的成果推論，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極有可能埋藏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澱物。外國專家經過多年研究得出的“中國貧油論”，他從大膽假設和懷疑做起，以嚴謹的治學作風，向自然界小心推斷和求證。任何一個山頭、一個溝壁、一排裂縫、一堆亂石，他都不輕易放過。他要按照自然規律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到的地質學的真理。在中國這遼闊的土地上，從十九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英國、法國、瑞典等國家的地質學家到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差不多成為業界的定論。蘇聯的專家們也眾口一詞，認為因此中國沒有石油蘊藏的客觀物質條件。他摒除狹隘的、主觀的愛國家愛民族的想法，純粹從嚴謹治學的立場對地質力學有另闢蹊徑的構思。而為了論證自己的假設，他在共和國建國初期基本上與外界隔絕的惡劣條件下，在缺乏外國參考書和無法與外國專家交流的艱難情況下，硬是闖出了一條新路。早年他考察黃山時，已經寫出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隨後他轉而踏破廬山，就在廬山腳下，把研究的各項成果放在一個他命名為“白石冰川陳列館”的地方。抗戰

爆發時，他剛完稿的“冰期之廬山”，因時局困難，沒有機會出版。他對中國地質構造的初步構思，要等到十年後，待局勢稍微穩定下來了，才得以出版。建國初期，他人在歐洲，在大學裏任研究員兼有教職，生活穩定，而且正是人到中年，初步有某種程度的富足。不知道他為何情願，毅然拋棄上半生辛勞換回來的成就和地位，讓下半生再起波瀾。當年他被共產黨邀請回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就做好回國的準備。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派人和他接觸，遊說他去臺灣，並要求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的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他當機立斷，拋下妻兒，當晚就隻身離開倫敦去法國，再輾轉經德國進入瑞士邊境上的巴塞爾，然後再設法通知在倫敦的妻小往聚。他們一家三口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當年十二月啟程秘密回國。夫婦倆人原本安排好了的，在海外以教研終老的計畫，因著共產黨當年對知識份子的建國號召，他就是這樣義無反顧去響應。他回到國內時，可說是傾家蕩產、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凡百都得從零做起。

而他在寫給兒子的家書裏面，絕無任何對共產黨抱怨的半言只語。他對共產黨的階級理論和鬥爭哲學真是知之甚少。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原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是利用、教育和改造。換句話說，共產黨從來沒有把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是勞動成果或是價值創造，從來沒有把知識份子當成是革命的同路人。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哀。在接受黨的再教育過程中，他學到了原來要他夾著尾巴做人，要他虛心地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思想教育，要接受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改造，要學會階級鬥爭，而且那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知識份子不但是要被使用的，而且更是要被利用的，是要接受黨的絕對領導的。何況這改造過程原來是沒完沒了的，知識份子終其一生像是有反動階級烙印一樣，那莫名其妙的原

罪是永遠磨滅不了的，改變不來的。最可恨的是，原來知識愈多是愈反動的，階級是有血統的，知識份子的子女也因此政治上是要備受歧視的。

而希平自己，大半生聽從父親的教誨，兢兢業業，唯慎唯勤，每事不出頭，犧牲了多少機會。因為沒能入團入黨，申請獎學金不成功，申請出國留學不成功，申請移居香港更不成功。這情況到劉少奇主政那三兩年才有點改善，他和母親才有幸去了香港。少年時期碰上反右，希平很快就被打擊得意志消沉下來。他自己憐惜自己，像是無父的孤兒。他懷疑這個制度，抱怨生不逢辰。母親這麼多年以來，和他及弟弟三人相依為命，逐漸地把父親前半生的經歷點滴告訴希平。他為父親早年在海外的廣泛閱歷和成就感到震驚，午夜夢迴時，不免痛恨父親當年為什麼把他帶回中國。他有衝出樊籠的慾望。還好他離開得早，不然像他這樣年紀的一整代人，在文革期間都會被犧牲掉。弟弟留在國內，只是寂寂無聞的一個小學教員，而且“政治面貌”是所謂一般群眾，平日事無大小，他都噤若寒蟬，領導上要找他的岔子，或者要藉辭找他當做右派分子批鬥，也苦無藉口。唯一可以咒罵他、蔑視他、作踐他的，就只剩下“落後分子”這一頂帽子。他同情弟弟，知道他心底是明白的，頭腦是清醒的。他要這樣做才可隱姓埋名，明哲保身。他對弟弟有終生的歉意，因為兄弟之間只容許一人出國，而弟弟把機會讓了給他。他自己在香港，也是一無作為。也許他心靈深處，說不定是要以一事無成，來報復父親對他的過度期許，或者更是因為他怨恨父親長期捨他而去，未能為他做出更好的安排，因此潛意識裡面他自暴自棄，也未可料。

那天在火車站前，父親為妻兒送行，從老遠趕回來，僕僕於途不得休息。當年他們三人都沒有想到，這次竟是生離死別。或許父親心內有這不祥的預感，他顯得特別張惶失措，坐立不安。握著希平的雙手都是虛汗，濕漉漉的感覺，在希平的

腦海中留下永久的不可磨滅的記憶。父親年青時拉得一手動聽的小提琴。那只提琴,還是他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念博士學位時,珍而重之地買下來的。當天他鄭重地把提琴交到希平的手裏。“爸爸沒有什麼值得的珍貴的東西給你。這個你保存著。見到它就像見到我一樣。這大半輩子,我沒有什麼遺憾的了。恐怕到頭來還是爸爸負累了你。來生若有緣,還得再做父子一場。”這親切溫暖的話語,聽在希平的耳中,如此清晰而安詳,那帶淚的聲音,低迴掩抑,令希平不忍記憶,但越是不忍回憶,越是要回想起來。那天父親把一包又一包的東西,橘子餅乾什麼的,往他的桌子上堆放——剛才老遠地蹣跚地跑到對過的月臺邊上,從攤販那兒擠著搶著買回來的。希平只喊得一聲:“爸爸!”眼淚早已奪眶而出。火車快要開行了。嗚咽一聲汽笛長鳴,劃破長空,驚迴千里夢。真是“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父親啊!是的,來生若有緣,讓我們還得重新再來,還做父子一場。”他在心內這樣淒涼地吶喊著,但就是說不出口,因為早已泣不成聲。他哭成淚人似的,緊緊抱著父親那虛弱的身體,整個人像要眩暈過去了。這可詛咒的年代,這最不幸的年代,讓人們骨肉分離,要人們間關萬里,牽腸掛肚。這一刻,他感到絕望,恨不得就這樣和父親雙雙死去。

父親的死訊在十五年後傳來。而這十五年,原來就這樣陰陽永隔,好像這十五年都枉過了。何苦多活這十五年。統戰部一併通知,說要把父親的骸骨移入八寶山,說要追諡他為共產黨員,同時要發決議,追認他一生在地質力學和勘探石油蘊藏方面的豐功偉績。他對此感到漠然,只是不忍心代父親拒絕這遲來的肯定。

或許這一代的中國人做出點犧牲還算是值得的。沒有這可哀的荒謬的年月,也真還反襯不出中華兒女的艱苦卓絕!父親可說是求仁得仁。他是中華民族的孝

子。在這大時代裏，做出貢獻，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控訴他們為什麼這樣逆反地對待一整代的知識份子，或許對日後中國重整國魂上路有好處。一紙平凡的決議，聊勝於無。但終究還是字字千金重。

可惜母親早就不在了。還好，她逝世時以為父親還健在的。這一生希平他自己是多少枉過了，因為生活在父親巨大的影子之下，時代容不得他發揮。那沒有什麼，因為一整代的中國人都陪著他遭此橫逆。有這麼多人陪著他，同樣地如此這般慘澹地熬過來，夫復何言。父親在天之靈，除了浩然仰天長歎之外，還能夠說些什麼呢？而且中國如今雖然變了個樣子，是否就已經幡然悔悟，從此糾正過來了呢？他不敢肯定。在這淒迷的歷史的陰影下，長長地拖在地上的，就只有這個不確實的問號。此外，也許還有希平嘴角一絲不易察覺的悲哀的苦笑和轉身時揮動的微弱的淒涼的手勢。

闕品方

(完稿于臺北，2012年12月16日)